

# 宋代官员诗人酬唱论略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官员诗人是宋代诗歌创作酬唱主力军,他们的创作酬唱塑造出宋代诗歌创作酬唱的主流形态与基本风貌。官员通过立朝、外任与贬谪等方式,驻足、行走于两宋的各个地域,并通过诗歌酬唱创建全国性的诗歌网络,使每个地域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官员阶层特有的品阶、官职及政见,是影响官员诗人酬唱对象与酬唱圈层的三大身份要素,这令其诗歌酬唱无法脱离层级、功利与政治。官员的身份层级不同,其酬唱风貌及审美情态也不尽相同,高层与低层差异最为明显,而只有精神上超越了世俗层级制约的官员诗人,才可能成为官员诗歌乃至宋代诗歌的审美主流。

**关键词:** 宋代官员诗人; 业余酬唱; 身份要素; 层级审美与超越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4)01-0052-08

## On the Responding With Poetry Between Officer Poets

LV Xiaohuan

(Institute for No-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Officer poets are the main force of creating the responding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ir poetry shapes essential aspects in form of the responding poetry and characterized its basic features. Being an officer in the Royal Government or outside the national capital, or after relegation, they travel and stay at various reg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to enable the cultural activity of each region to enter the public vision by the responding poetry, and a nationwide network of poetry is created. Three identity elements influencing the responding objects and the circles are as follows: the specific official level of the official class, official position and political views, which makes their responding poetry unable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hierarchy, utilitarian and politics. The style and the aesthetic modality vary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dentity hierarchy of officer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nior officials and low-level officials is the most obvious, only the officer poets who surpass the secular level restriction, can they become the aesthetic mainstream of officer poetry and poetry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officer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amateur writing of responding poetry; identity elements; hierarchy of aesthetic and surpassing

考察现存诗歌的创作主体身份,可以肯定宋代诗歌创作酬唱的主力军,就是通过科举、门荫及其他渠道走向仕途的各级官员。官员以外诗人的创作酬唱虽说存在并且发展,但在两宋时期还未能形成与

① 另撰一文《非官员诗人身份及其结构变化与两宋诗歌酬唱》。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提出并阐述了“士大夫文学”及其周边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收稿日期: 2013-1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编号: 11BZW048)

作者简介: 吕肖奂(1965-),女,河南灵宝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元文学。

官员诗人势均力敌的力量。<sup>①</sup>主力军的这种官员身份特质,很大程度决定或塑造了宋代诗歌创作以及酬唱的主流形态与基本风貌。在关系本位伴随着官本位的两宋社会中,官员们特别是文官们的审美情趣、交游酬唱、风气习俗等群体取向,引领着整个时代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潮流。

## 一、俗务与雅趣:本职之余的诗歌创作酬唱

今天的人们很难将官员和诗人两种身份联系在一起,因为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员需要循规蹈矩、严肃而理性的管理能力,而作为精神领域创造者的诗人需要的是超凡脱俗的激情才华,二者所从事的工作、需要的才能几乎具有相反的性质,甚至没有可以相容的空间。但在中国古代,这两者却毫无困难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普遍又普通的现象,并因此而构筑出三千年的诗歌帝国。

诗歌创作酬唱并非任何一种官职的必须,即便是在宋代最需要创作才华的两制与馆阁。<sup>[1]</sup>的确,在宋代的皇帝制度与中央行政机构中,两制与馆阁对任职官员的文化素养以及文学创作才能要求最高,但是仔细考察其执掌的具体事务,则学士院中的翰林学士掌“内制”,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前隶属于中书门下的舍人院、改制后隶属于中书省的中书后省掌“外制”,而掌两制的官员必须擅长撰写朝廷公文,尤其是翰林学士要“代王言”,对骈文四六创作水平要求最高。这类朝廷公文与诗歌创作并无交涉。除了偶然撰写时令帖子以及青词这类仪式化习俗诗歌外,几乎没有其他方面需要两制官员更多的诗歌创作才能。

馆阁即改制前的崇文院之三馆秘阁和改制后的秘书省。馆阁官员的本职是掌管国家图书秘籍及缮写校勘其所藏,后来有了充当皇帝顾问的义务以及其他官员们艳羡的晋升捷径。究其职责,馆阁需要的主要是具有文化素养兼政治素养的饱学之士,也并非具有创作才华的诗人。

就连人们认为最需要文学才华的两制与馆阁,都没有直接要求诗歌创作,何况其他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况且两制馆阁只是两宋极其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极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需官员数量十分有限,与其他机构的官员数量相比,几乎不成比例。两宋大多数中央及地方行政与军事机构,执掌的都是十分具体的专业事务,所需的是各种专业技能,而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修养尤其是诗歌才华,如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省下设的附属机构中,铨选官员的铨曹四选、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院、掌管朝廷礼仪的礼仪院与太常礼院,此外,处理军务的军事统帅机构枢密院,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监察机构、处理财政事务的三司、总领供奉官的宣徽院、掌内外廐牧之政的群牧司,还有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大部分中央行政机构,加上地方监察机构即“外台”,总称“路监司”,包括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等,以及地方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和地方治安机构等等,<sup>[2]</sup>均处理的是十分具体而专业的事务,需要官员施展其处理各种政务、军务的才能,而这些事务常被一些游心物外的官员诗人们称之为“杂务”或“俗务”,全非文臣们乐于展示创作才华的“雅务”。

既然所有官职对官员的诗歌创作都并没有什么强制性要求,那么两宋官员为什么不断创作诗歌且用诗歌交往酬唱呢?这自然是因为官员们从小都受到科举考试要求的撰写诗歌训练,整个时代社会对诗歌的普遍热爱欣赏,更重要的是诗歌已经成为官员们表达生活的爱好兴趣,成为官员间交往交际的必要工具。诗歌创作才华到了宋代已经成为衡量官员个人素质的一个参考指数。在唐代“诗国高潮”之后,宋代以及此后的元明清在官员认知评价系统中,已经将诗歌创作视为每个官员必须具备的才能与修养。杨亿说“善歌者必能继其声,不学者何以言其志?”<sup>[3](卷七)</sup>如果一个官员连诗歌创作酬唱才能都不具备,会被视为缺少修养而不被社会认可。

宋代官员诗人常常谈到他们的本职工作与诗歌创作酬唱之间的关系。当他们身处清要官职,闲暇日多,创作酬唱就成为日常生活之重要内容,如李昉《二李唱和集序》中所言“南宫师长之任,官重而身闲;内府图书之司,地清而务简。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而当其官职变化,职事繁忙,则如李昉所云“余再承纶綍之命,复登廊庙之位,自兹厥后,无暇唱酬。”

诗歌酬唱是需要时间与精力的创作,而政务同样需要时间精力,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官员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与汉魏六朝贵族士大夫大多追求“居官无官官之事”的潇洒出尘

不同,宋代科举士大夫<sup>①</sup>多数认为官员的本职事务最为重要,即便是纠缠人的“俗务”,也当用心处理,而诗酒唱和的文采风流只能是业余行为。作为宋代士风的倡导者、建设者之一,欧阳修对官员职责与创作之间关系的态度,成为不少官员诗人的普遍共识。《宋史·欧阳修传》云:“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吏事”与“文章”之间,欧阳修有科举士大夫的清醒认识,“吏事”是兼济天下的大事,而“文章”只是独善其身的小事,自然“吏事”重于“文章”。直到南宋后期,不少官员诗人仍认为“吏事”当先于“文章”,如刘克庄《陈敬叟集序》云:“宝庆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专习为吏。勤苦三年,邑无阙事,而吾成俗人矣。”即便是县令一级的低级官员,也需要尽职尽责做好,而创作酬唱一类的个人“嗜好”只能禁止或退居其次。

尽管宋代官员诗人常常有摆脱“俗务”而从事雅趣、厌恶官场而向往山林的表达,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士大夫或佯狂或遁脱或隐居那样的名士风流,毕竟因为没有世袭的地位与经济实力,他们只能在权衡利弊考量轻重之后选择居官妥协,用“中隐”或“吏隐”的方式解决本职与业余的矛盾。

官员诗人创作酬唱的主题,较少涉及其本职工作,也较少谈及朝廷大事,以至于后世阅读他们的诗歌时,往往会忽略他们的官员身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用骈文古文处理本职工作的“俗务”,而习惯用诗歌处理他们的业余雅趣,这种文体策略造成完全不同的效果:文章几乎全部是其官员身份表达,而诗歌则是对官员身份的剥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意追求超越“俗务”的“雅趣”,以显示向往身份以外那种山林江湖的精神世界。

因为联络感情、扩大交际网,有助于官员的仕途发展,所以官员的社会交往,比普通百姓的交往需求显得更为功利,也进行得更为频繁。在宋代科举士大夫的阶层意识逐渐自觉的语境中,作为文化人、诗人的官员,他们有意用文化和文学将他们自己与普通百姓的交往方式区别开来。官员的交往方式有无数种,而诗歌酬唱,被强化成这一阶层人际交往的一种最为风雅不俗的手段,成为官员风雅的标志。因此“俗务”之外,官员最大“雅趣”就是诗歌酬唱,但诗歌酬唱却因辅助其身份的作用而成为其官员俗务的必要延伸,雅趣也因而成为其俗务的一部分,矛盾因而被化解。

## 二、立朝、外任与贬谪:流动中由酬唱创建的诗歌网络

作为帝国的各级管理者,官员遍布普天之下。官员的流动与走向几乎完全是强制性的,朝廷的任命不会因为个人意愿而轻易改变。官员所到之处除了执行朝廷的政令外,主要的任务是传播文化,在交通不发达文化发展不均衡的时代,官员的职务型移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交流传播。官员的酬唱也随其行迹而延伸到王土的每个角落,无远弗届,即便是偏僻荒凉的地方,也会因官员的外任或贬谪而以酬唱的方式将其纳入全国性诗坛网络。

京师是中央行政机构所在地,是官员最为集中的区域,自然也是官员酬唱最为兴盛的区域。无论是汴京还是临安,官员的酬唱都引领时代风气。在诗人集中的政府机构中,官员酬唱的诗歌会被结集流行并形成传统,如学士院酬唱有《翰林酬唱集》、《禁林宴会集》,三馆秘阁酬唱有《西昆酬唱集》等等。当然这些酬唱集中的诗人并非只限于某一个机构中的官员,但此机构中的官员确实是酬唱的中坚力量。馆阁官员酬唱形成了例行的“故事”,如“曾巩通判越州,临行,馆阁同舍旧例饯送”,以至于当熙宁、元丰中馆阁酬唱之风一度消失时,许多官员都认为这是士大夫风雅精神的消歇,十分痛心。苏轼《见子由与孔常父唱和诗,辄次其韵。余昔在馆中,同舍出入,辄相聚饮酒赋诗。近岁不复讲,故终篇及之。庶几诸公稍复其旧,亦太平盛事也》云:“吾犹及前辈,诗酒盛册府。愿君唱此风,扬觝斯壮举。”<sup>[4] (p1480)</sup> 翰苑馆阁酬唱作为“太平盛事”象征,带动中央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酬唱,带动了京师酬唱。

皇帝亲自主持的宴集酬唱,往往汇集了各个部门的高层官员,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员酬唱形态,指引着官员酬唱的方向。“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sup>[3] (卷七)</sup>早在宋太宗、真宗时,“君臣”“公卿”的酬唱就已经蔚为大观,直到南宋,这种风气也久盛不衰。

<sup>①</sup> 参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其中论及科举士大夫与封建士大夫、帝国士大夫、门阀士大夫之不同。

京师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唱和,如锁院唱和,是一群官员因为科举或其他机密工作原因被较长时间与外界隔离,在密闭的空间里以诗歌唱和消解工作生活的单调乏味,锁院唱和形成了一些大型唱和集,像《礼部唱和诗》、《同文馆唱和诗》,影响到一些地方的锁院唱和。

京师官员之间经常有各种理由的大型集会酬唱,其中以送往迎来的酬唱为最多。譬如杨亿至道四年由馆阁而外任处州,“公卿巨儒,台阁髦士,寮案之际,朋从之间,相率赠言以宠行迈者,凡三十八人”。<sup>[3](卷七)</sup>这种因个人事件而形成的高官酬唱盛举屡见不鲜,足以看出官员酬唱的规模以及兴盛之程度。

集会式酬唱是京师官员酬唱的常见形式。大型集会酬唱之外,京师官员小范围、小规模私交性的集会酬唱更加频繁。相对而言,小型酬唱的官场应酬性成分降低而情感交流成分提高,如陈傅良《止斋集》卷四十《张园送客分韵诗序》云:“而叔访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恍然不满,饮饯弥日,相与咨嗟叹息也。最后,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饯之张园。”这次小型唱酬显然是同情者发泄共同情绪而声援二位外任者的行为。

紧邻京师的京畿之地,如北宋的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以及四京周边地区,南宋临安附近的江浙地区,其政治文化地位仅次于京师,除了任职官员酬唱外,致仕或退居、闲居官员的酬唱也自成风气。

外任官员将酬唱带到边郡如延安、定州,也普及到徽湖湘粤等文化欠发达地域,如《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倪恕《安陆酬唱集》六卷;贬谪官员更将唱酬风气延伸到偏僻落后地域如商州、黄州、儋州等。官员通过诗歌酬唱,提升了任职地的知名度以及文化品位。

由于地方政府机构较少且相对分散,官员也不像京师那样大量和集中,所以地方官员之间的酬唱规模不会超过京师。地方官员一般进行小规模酬唱,监司、郡守、知县如果本身擅长诗歌或是喜好风雅,经常会参与、组织或主持其下属集会酬唱,下属之间也会因兴趣相投而唱和。《文渊阁书目》卷二记载当时有《郡斋酬唱》一部三册,因遗失而无法探知其酬唱人员的身份和酬唱方式,但由此记载可以得知,郡斋酬唱也像京师的馆阁酬唱一样,形成地方酬唱的传统与风气。

邻郡、邻县以及更远距离的酬唱,也是地方官员酬唱的主要方式。如知吴县罗处约与知长洲王禹偁唱酬,就是两位基层官员因同年关系而通过邮传的邻县唱和。又如赵抃与程师孟为邻郡郡守时唱和:“南阳公与广平公,其登进士第也为同年,其守浙东、西也为邻国;又皆喜登临、乐吟赋,故其雅好,视游从中为厚,而山川览瞩之美,酬献之娱,一皆寓之于诗。旧所唱和多矣,集贤林公既为之序。”<sup>[5](p1265)</sup>这种跨越时空的官员唱和,是中唐元白以来风雅传统在宋代的发扬光大。

多数官员到地方工作时,都愿意礼贤下士,与当地诗人文人交往,如秦观《与参寥大师简》云:“扬州太守鲜于大夫,蜀人,甚贤有文,仆颇为其延礼。有唱和诗数篇,今录一通去,当一笑也。”这在当时路、州、县官员中是较为常见现象。地方官员与地方诗人唱和,直接影响当地的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刘克庄《陈敬叟集序》云:“其为县令时忙于本职工作,无暇唱酬,‘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骚人墨客如陈敬叟、刘圻父、游季仙辈,往往辱与之游。主人久废诗律,不复有一字,常命小吏设笔砚,观众宾赋咏,以为乐。’虽然未能参与唱和,但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其诗名本身以及支持地方诗人的具体行为,也促进着地方诗歌发展。”

官员们会因为同年、同僚、同乡等各种人际关系,而建立并保持唱酬网络正常运转。京师的大小型公私集会酬唱,将官员诗人构成酬唱网络。京师酬唱结集或抄录后,经常由好事者寄给京师以外的官员朋友,使得外任官员能时刻保持与京师诗坛的联系。京朝官外任或贬谪,也会把京师的酬唱风气带到路以及州府军监乃至县乡镇。通过京师与地方多渠道、多向度而进行的诗歌酬唱,构筑出全国性诗歌网络。两宋诗坛就这样由官员酬唱为主要方式,而呈现出基本形态。没有官员,诗歌创作就不会遍布王土;而没有酬唱,就无法将全国的诗人连接到一起建立诗坛。

### 三、品阶、官职及政见:影响官员诗人酬唱圈之三大身份要素

宋代官员队伍十分庞大,其俸禄待遇也相对优厚,这是官员诗歌酬唱繁荣的人员保障与经济基础。庞大的官员队伍有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以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等级催生官员诗歌创作精神审美

差异以及诗歌酬唱不同圈层出现。

宋代官制复杂,又有元丰改制前后不同,这里试图根据宋代官制之品阶而将官员大体区分为高、中、低三级。北宋前期官员品阶分为九品正从上下三十阶,元丰改制后九品正从十八阶。若仅以官品而平均分配,则一二三品为高层官员,四五六品为中层官员,七八九品为低层官员。高中低层的人数呈金字塔结构,其酬唱圈层大体与之相应,三层在编制上人数大体稳定,只是具体官员可以随时流动。这种理论上的分层固然可以划分出官员的层级与酬唱圈层,但无疑过于简单化。

参与诗歌创作酬唱的主要是文官。宋代官制将文官分成九品三十七寄禄官阶,并将从一品第一阶到正八品第二十五阶之间称之为“朝官”,从八品第二十六阶到从九品第三十阶称之为“京官”,将从八品第三十一阶到从九品第三十七阶称之为“选人”,若按元丰后寄禄官阶,则通直郎以上为“朝官”,承务郎以上为“京官”,迪功郎以上为“选人”。其中选人与京官,从官品上看区别不大,都是从八品、正九品,但是却有实质上区别,选人必须经过磨勘及五个举主举荐改官,才能跳出选调,升入京官序列,然后仕途方可通达。<sup>[2] [p666]</sup>因此,官品并不能完全说明官员的差别。选人往往对举主感恩戴德,不仅写谢启如孔平仲《谢运使举京官状》之类表示感谢,还常与举主酬唱终生。

选人自然是低层官员,而京官虽比选人“正式”,但离中高层距离尚远。由京官升到朝官也很不容易,即便是科考状元也未必能晋升到朝官,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云:“张唐卿,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而朝官内部的差异就有八品三十阶之多,自然又可分出多种层级。官员诗人们熟知这些等级差别,在诗歌创作酬唱时常常会有自身官位升降变化带来的情绪流露。

之所以如此强调官员的层级,是因为在宋代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官员的等级制度是由朝廷明文严格规定,期间的各种差异决不允许随便逾越。官品决定官员的服色,规定官员的俸禄等物质层面的待遇。<sup>[3] [p7]</sup>当官员穿着朝廷规定的官服出现在公私场合,其服色时刻提醒着官员的身份与地位,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官员的心理与精神,影响其创作表达。几乎没有哪个官员会超脱到不受此影响。

官员的层级,虽然并不反映其诗歌创作酬唱的水平,但却决定或影响其工作生活方式、酬唱对象与审美理念。不同层级的官员有不同人际关系,也就有不同的酬唱圈。譬如一个高层官员诗人,其酬唱圈中最多的酬唱对象一般是同僚以及品级不相上下的其他相关官员,北宋王珪的酬唱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盖禹玉仕早达,所与唱和,无四品以下官。”<sup>[6] (卷三)</sup>这可能是个高层官员酬唱圈比较极端的特例,但也能代表一批仕途顺达官员交往酬唱的一些共同特点,像杨亿、钱惟演、晏殊、宋庠、宋祁等西昆体诗人就是如此,其他时期也都有这样的高层官员。在等级森严的官场,官员的酬唱对象颇受其人品阶身份的制约,其交游酬唱圈的个人选择度相对较小,特别是高层官员。

中层官员人数超过高层官员,活动范围不限于朝廷与京师,交往相对自由,个人选择度较高,酬唱对象面最广,是联络高低两层的纽带,酬唱圈会不断扩大。只有小部分中层官员可以上升到高层,而大多数官员会停留在中层,荣辱得失是每个官员都会一再思考的问题。

低层官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释褐不久的低层官员,他们初入仕途,一面适应官场生活,一面交往官场中人,开始形成个人的交游酬唱圈,如欧阳修、梅尧臣等“八老”在洛阳时期就是典型的例证;另一类是已入仕途多年,但久为选人或京官,沉吟下僚,不免叹老嗟卑,常常自视为江湖中人,不少人更愿意与江湖(非官员)中人往来,从中找到共同的话题与情趣和慰藉。

实际上,宋人更注重从实际职务上区分官员的高低层级,他们将四品以上清要官如台谏官、馆职、监司、郡守等称作“侍从官”,其地位在宰执官下、庶官之上;将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称之为“小侍从”;而将除此外的文官统称为“庶官”。<sup>[3] [p664-665]</sup>“侍从官”与“小侍从官”的品阶不一定高,权力也不一定更大,但比“庶官”更显要清美,所以成为大多数文官们梦寐以求的职位。而“侍从官”与“小侍从官”的确是官员诗歌创作酬唱的主要力量。

王禹偁《送牛冕序》云:“今天下之士由科试入仕者以第进士为美名,隶京官者以游三馆两制为近职,厘外务者以任刺史二千石为亲民,语名郡者以丹阳为重地。”可以看出官员们的仕途理想追求,也为馆职与郡守被视作“侍从官”作了证明。《青箱杂记》记载:“翰林学士李宗谔以京官带馆职,赴内宴,阁

门拒之。献诗曰‘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无繆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公尝举进士,御试下第,因及之。太宗览诗,即宣赴坐,后遂为例。虽选人带馆职,亦同赴宴。”选人与京官虽非朝官,但带了馆职就可以出席御宴,由此可知实际官职比官品更受人重视。

具体的官职之所以比官品更能决定酬唱圈的形成,还因为实际的工作环境更能限定人的交往对象。馆阁酬唱中,其官品有差别,但从事的共同的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形成酬唱圈。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官员,其职务范围内的同僚与上下级以及相关部门的官员,自然会成为其酬唱圈层中最为重要的成员。

官员的一大特点是其无法剥离的政治性。每个官员都会不可避免的有个人的政治观点或倾向,在宋代党争、政争不断地年代,诗歌虽然不像文章那样是党争、政争最直接有力的武器,但官员诗人的酬唱圈却往往成为判断一个“朋党”的重要证据,乌台诗案是最明显的案例。官员诗人的政治圈与酬唱圈,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性。后世根据每个官员诗人的酬唱圈中由远及近的几个圈层酬唱对象酬唱疏密度,基本可以判断出其朋党范围,如庆历政争、熙宁元丰党争等等,诗坛上出现明显以各自政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酬唱圈。

郑刚中《北山集》卷四《谢宇文郎中书先夫人埋铭书》云:“每欲挟此术以观当世贵人,则廊庙馆阁之间端人正士,既非穷贱寒生所及识,而又翰墨尊贵秘藏难得,脱或挥洒到人间,则又非穷贱寒生之所可见,故孤怀常抱慕望不足之叹。”说明官员各个层级之间特别是高层与低层之间交往十分困难。

当然,各层级之间的交往酬唱,并非绝对不可能。低品朝官、京官及选人,乃至非官员诗人都可以投赠拜谒高官,高官也会有酬和以表示礼贤下士,因而会产生超越身份等级的纯粹文字之交、唱和之友,像王安石与王令、蔡肇、郭祥正等;又如南宋时一些高官与权贵(包括宗亲、外戚、武将)渐兴养客之风,主客之间会有些酬唱,而大多时间是高官作为主持人提供机会让客人创作酬唱,将高低级关系变成主客依附关系,其身份性质颇有变异,因而有所不同。

关键的是,官员的仕途按正常顺序是由低到高的按序升迁,而具体到每个官员,其宦途都不尽相同,会有顺逆之别,或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或大起大落、蹭蹬蹉跎,但无论如何,每个官员都要经历官品官职的升降变化,因此官员的层级并非一成不变,其酬唱对象与圈层也会随之变动,不会完全固定。只是比较而言,品阶、官职与政见,是影响官员诗人酬唱圈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与非官员诗人酬唱圈不同的标志。

#### 四、富贵、寒瘦与“超迈”:官员酬唱之层级审美及其超越

《四库全书总目》卷159为陈棣《蒙隐集》所作提要云:

宋季江湖之派,盖其足迹游历,不过数郡,无名山大川以豁荡心胸;所与唱和者,不过同官丞簿数人,相与怨老嗟卑,又鲜耆宿硕儒以开拓学识。其诗边幅稍狭,比兴稍浅,固势使之然。

该段话特别强调,诗人因其自身身份而限制其游历范围与唱和对象,从而影响其诗歌的“边幅”与“比兴”等质量要素。

这段话显然是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观点的更加明确化表达。苏辙书中云:“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后世人们对其中所说的名山大川之作用颇为重视,称之为“江山之助”,但对其中所说京师宫殿以及交游唱和之类的“人文”之助却鲜有提及。实际上,相对于人与江山自然的单相交流而言,人与人文之间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其助力应当更为加倍显著。酬唱是“人文之助”最直接的方式,酬唱对象有助于酬唱主体的水平,而其助力自然因人而异。

官员的身份层级不同,“所与唱和者”即交游酬唱对象的身份层级自然会有差异,其酬唱所呈现出来的风貌以及审美趣味因而也不尽相同。其中高层与低层官员的区别尤为明显,“早达”的王珪与长期沉吟下僚的陈棣,就是两极的典型代表:与王珪酬唱的都是“四品以上”的达官贵人,自然一派雍容华

贵;而与陈棣酬唱的都是“同官丞簿”,自然一色的纤琐寒俭。陈鹄《耆旧续闻》卷九云:“祖宗朝,一时翰苑诸公唱和,……皆粲然有贵气。”宋初翰苑馆阁酬唱的贵气粲然,与宋末江湖诗派的寒俭贫薄形成鲜明对比,其酬唱主体与对象的身份差异无疑是最重要因素。《韵语阳秋》卷一云:“人言居富贵之中者,则能道富贵语,亦犹居贫贱者,工于说饥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贵,则其诗章,虽欲不富贵,得乎?故岐公之诗当时有至宝丹之喻。”这虽然过于夸大创作主体之具体物质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但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秦观《会稽唱和诗序》是为两位高官的短期唱和集而作:

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广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阳赵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归。……而道于越也,复得二十有二篇,东南衣冠争诵传之,号为盛事,以后见为耻。或曰:昔之业诗者必奇深远取,然后得名于时。今二公之诗,平夷浑厚,不事才巧,而为世贵重如此,何邪?窃尝以为激者辞溢,夸者辞淫,事谬则语难,理诬则气索,人之情也。二公内无所激,外无所夸,其事核,其理当,故语与气俱足,不待繁于刻划之功,而固已过人远矣。

秦观认为程、赵二人的酬唱诗歌“平夷浑厚,不事才巧”,超过一般“业诗者”,是因为二人内心平和、明白事理,达到了一般“业诗者”难以达到的理性圆融境界,而这种精神境界,显然是由他们长期身居高官的身份养成的。

宋人在诗话笔记中津津乐道的“富贵气象”、“富贵气”或“贵气”,其实表达的是对高层官员之审美趣味的某种认同。宋代高层官员诗人比唐代多,<sup>①</sup>且逐渐形成了“科举士大夫”进入高层之后所追求的属于自身阶层的趣味,即“尚富诗学”。<sup>[7](p449-468)</sup>白体、西昆体以及后西昆体等体派的酬唱诗歌,正是早期“尚富诗学”的代表。晏殊之所以成为“富贵气象”的代表,主要是他能把自身的“富贵”生活用诗歌十分优雅地表现,能够把儒释道至少口头上常“鄙视”或讳言的“富贵”去表面化、去外在化,而让“富贵”更有文化内涵,隐去炫富炫贵般的庸俗。宋代高层官员意识到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并非士大夫应该炫耀的终极理想,所以用诗歌去化解实际生活中这些过于世俗化的观念,自觉追求一种符合“王公大人”身份的审美理想:这就是超越华贵语言表层的“富贵气象”,也表现为“平夷浑厚”的风格。这种“富贵气象”体开后代台阁体先河。

低层官员的生活境遇受人同情,其审美追求也比高层的更易于被人接受。“诗人薄命”以及诗歌最适宜“薄命”寒士去创作的观念,至少从唐代开始就被日益增多的人们广泛认同。<sup>[8](p99)</sup>京师与地方的大多机构都会有高中低层官员,而县级的令丞簿尉应该是最低层级官员的代表,是最接近山林草野的官员,他们的诗歌类远离庙堂的“寒士体”。县丞、簿、尉属于基层中的基层,待遇颇低,南宋时一度连官俸都无法从政府领取,只好盘剥更低一级:“又闻县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给去处。里巷谚语至有‘丞簿食乡司,县尉食弓手’之谓。丧失廉耻,职此之由。”<sup>②</sup>而县尉更甚于丞簿,《休宁县尉厅壁记》云:“尉之为职甚卑,而其责甚重。然常以文臣初入仕者为之。凡文臣初入仕,非进士擢第,则士大夫之子弟,以文臣治武事,居甚卑之位,任甚重之责,而属之不习吏事之书生,与不知稼穡艰难之任子,故今之为尉,而以能称者常少。”<sup>[9](卷十一)</sup>这些“不习吏事之书生与不知稼穡艰难之任子”,自然无法称职,所学与所用,在专业上的不对口,让他们更乐于用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与当地文人一起在县衙周遭吟咏酬唱,抒发怀才不遇的幽怨,“相与怨老嗟卑”表现出与“富贵气象”完全相反的“寒酸气”、“寒俭态”。<sup>③</sup>

许多刚走上仕途的诗人都写这样的诗歌,如张咏《乖崖集》卷三《县斋秋夕》:“才薄难胜任,空销懒惰情。公堂群吏散,苔地乱蛩声。隔岁乡书绝,新寒酒病生。方今圣明代,不敢话辞荣。”寇准知巴东县所写的《县斋春书十二韵》:“望断天涯外,离魂欲不禁。”就很像唐代姚合、贾岛做派,充满牢骚与哀怨,

① 胡应麟《诗藪》杂编卷五“古今诗人,穷者莫过于唐,而达者亡甚于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② 见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六《申尚书省乞将本司措置俸给颁行诸路》及其下云:“某昨因巡历,屡见右选小官诣某自陈,以州县拖欠俸给,饥寒穷迫,或任满积年,无资可归,或身没官所,不能归葬。虽与严判行下,多是不即遵从,或止支給些小以塞责。”四库全书本。

③ 《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七引《中兴词话》云:“光尧称赏良久,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也。‘重扶残醉’,原词作‘重携残酒’,高宗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气。’因改为‘扶残醉’。即日予释褐。”又牟巘《陵阳集》卷十三《挂蓑集序》:“无一艰涩寒俭态。”又刘过《龙洲道人集》云:“陶陶万事不复理,冻口且吐寒酸诗。”

在当地的唱和诗也如此。当他们仕途通达后,才改变这种“寒士体”。而许多久居低层的官员或无望京朝官的选人,一生都可能保持这种风格。

介乎高低层之间的中层官员,其酬唱风貌与审美趣味似乎没有高、低层那样特色鲜明,让人一目了然。这可能是由于中层官员交往对象的变化性比较强,可广交上下层官员,其酬唱风格或被归于上层或归于下层,以至于好像没有形成什么层级特色。实际上,中层官员是连接朝廷与地方、高层与低层的纽带,涉及的机构多、地域广,比高层人数多、酬唱圈大,而且当多数官员升级到中层时,往往正处于个人的理性年龄,其主体共同形成的层级审美自然也进入成熟稳定期。

站在中层官员的立场上看,高层之雍容富贵与低层的寒酸愁苦,各有其长短优劣,能兼取二者长处优点,摒弃其短处劣势,平淡中和,便是他们的审美理念。《诗人玉屑》卷15引《蔡宽夫诗话》云:“司空图善论前人诗,如谓‘元白为力勑气僵,乃都会之豪估;郊岛非附于寒涩,无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清高深渺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元白、郊岛之病,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高、低官员层级弊端,以中层审美眼光审视,皆需规避。这种中间层级的中庸审美,已经成为官员诗歌的审美主流,也成为整个诗歌的审美取向,因而被熟视无睹。

《华阳集》附录卷九云:“(王珪)平生未尝迁谪,多代言应制之词,无放逐感愤之作,故其诗多富贵气。”王珪的“富贵气”,产生于一生仕途平坦。而宋代多数官员诗人的仕途并不如此一马平川。如果宋代的官员诗人个个都人为物役,其诗歌完全受其仕途境遇等外在制约,而不能超然物外,那么整个宋代诗歌在精神、思想上就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

与久居富贵、久处穷约或一生平稳的官员相比,跌宕起伏于宦海的官员,既有立朝、外任经历,又有贬谪的历练,从而体验了官场的所有况味,在宦海的变幻无常中体悟生存之“道”,他们从精神上超越了穷达、贫富、尊卑,因而在诗歌创作酬唱上逾越各种层级审美,成为宋诗的审美典范。苏辙云“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sup>[10]</sup>(卷十五)而最优秀的宋人则是“闻道”之后能够超越世俗层级的官员诗人。

官员诗人的创作酬唱,本身就极具示范性,再与其政治地位、权力相结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学与文化普及以及社会风尚的风雅化。

#### 参考文献:

- [1]陈元锋. 北宋翰苑馆阁与诗坛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龚延明. 宋代官制辞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3]杨 亿. 武夷新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苏 轼. 苏轼诗集[M]. 孔凡礼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秦 观. 会稽唱和诗序[A]. 徐培均. 淮海集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6]陈 鹄. 耆旧续闻[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伍晓蔓. 从居富到处穷: 北宋尚富诗学浅论[A]. 第六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 [8]吴承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9]吴 儆. 竹洲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魏庆之. 诗人玉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责任编辑: 张立荣)